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一期 ——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8c)

---

【研究报告】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杨小凯
【悠悠岁月】我的一生	杨小凯
【亡灵祭坛】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	郑 义
【往事如烟】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华新民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报告】

###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

• 杨小凯 •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种奇特现象，这场革命尤其突破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许多常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了一个类似中世纪黑暗的时代。因此文革后的复兴既不同于历史上的戊戌变法，也不同于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文、史、哲、政、经，以及法律等各个领域都有复兴的趋势，其特点不完全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这种现象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自发串联组织起来的学会、杂志社、报社，甚至还有为政府提供咨询的智囊团组织。这类半官方的组织可以“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世界经济导报”、“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为代表，这批人靠自己学术上的成就或其他事业上成就在社会上立足，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逐渐形成非官方的精英阶层，而且在这场复兴运动中也倾向于承认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事实上，这个阶层相当于共产党制度下生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例如在抵制批精神污染运动时，这个阶层确实表现了其独立的力量。当然，这个精英阶层大不同于西方的绅士阶层，他们在政治上成功的要诀之一就是与党内的开明派有所结合和融通，可以说，这是中国政治格局的一种新的演变，而这种格局的形成是和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的。本文尝试对文革的背景、文革期间的社会力量、毛泽

东的政治战略作一分析，并探讨文革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何突破，以及对现代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 一、 文革背景的复杂性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不仅老百姓，整个社会上层也受到了物质匮乏的冲击，连外交部长陈毅都要派专车到农场去找食物。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教育六十条等一系列文件，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左的运动都被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接过去变成“在后面做文章”的“形左实右”的东西。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当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得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在十六条制定前后，毛泽东已经把左的一套东西推到了极端，他本来觉得利用共产党左的本质来号召党心是最容易的。但他的招数屡遭失败时，其政治敏感使他本能地对这一套失去了信心。但他又不甘心当一个被人表面吹捧的人，很希望能找到一条政治出路，使全党和人民从内心真正再拥护他。他当时对江青的信确实反映了自己这种绝望和挣扎的心情。

但是，毛泽东不愧是挣扎怪杰，他并没有停留于像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一样只是利用以下红卫兵而已。破“四旧”的红卫兵（所谓保守派）是由党团骨干、干部子女组成，他们把左的路线推到了极端后，使那些出身不好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人组成了造反派，这些人是对共产党特权不满的，毛泽东后来竟然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十六条制定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即把专制制度与市民之间的尖锐的政治矛盾作为一张民意牌任意操纵。一九六六年夏天，中国开始了全国性学生串联运动，这个运动带起了工人运动。工人中一些对党官僚不满的人与支持政府的所谓“保守派”形成了对立。前者甚至举着“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打倒省委书记XXX”的牌子上街示威。当时各级政府的干部都觉得那种气氛简直和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很多共产党员纷纷挺身而出，去与这些示威学生和工人作斗争（所谓围攻），以此来表达忠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竟指示党的机关报纸支持造反的学生和工人。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真是奇突，不过很多共产党员相信这又是毛泽东在玩反右运动时的那种钓鱼游戏。他们觉得自己更要站稳立场与新右派作斗争。于是在一九六六年秋，全国各级党组织掀起了一场所谓抓右派、黑鬼的运动，把夏天造反的工人、学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并动用警察逮捕了一些人。而这时毛泽东已决心利用党官僚与市民的矛盾来打民意牌和人权问题牌。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出席了首都三司成立大会，并支持当时还被大多数共产党干部视为反革命的蒯大富，首都三司之类的组织与以前由党团员干部串联成立的组织不同，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大多被打成过反革命，成员很多是出身不好，对官僚特权有种种不满的人。毛泽东号召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其号召的核心当然是人权问题。十七年来，每次运动都是用打反革命等残酷的迫害手段来对待政治异己，

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无疑是真正能号召人民的。从此，毛泽东开始重新抓到了民心的脉搏。他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单纯左的经济路线，而是同时也配合了一个打人权问题牌这种右的策略。至于究竟是毛泽东利用市民运动来搞宫廷斗争，还是市民利用宫廷斗争追求自己的人权，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也值得史学家去重新研究的问题。不过最奇怪的是，周恩来为什么在这个政治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会代表毛泽东去实施其新的战略？究竟是周恩来不懂这样做其后果会使社会主义政治产生历史性的转折？还是他心里很清楚，而愿意帮助毛泽东玩新的权术？周恩来当时行动的思想背景无疑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谜之一。

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这一转折点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北京的复杂性。毛泽东固执地坚持五年以来的错误思想造成了文革极左和荒谬的一面，而他在出境极为被动的情况下，一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常规，从右的策略出发还人权于民，又使他在政治上更为铤而走险，以致于使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制度危机越来越深。

## 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民意牌”

如上所述，毛泽东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正式调整了自己的新的政治战略，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帝王思想与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说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他的意识形态是和自己制定的新的真正战略相冲突的。由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甚至曾经也是一个极力鼓吹联邦制度的激进民主分子，当他在党内斗争中极度孤立时，民主总是弱者最喜爱的武器，于是他在青年时代的那点民主意识和中国帝王笼络民心的权术相结合，形成了他于一九六六年秋到一九六八年秋所采取的真正战略。但是事实上，这段时期真正的发展过程并不完全受毛泽东控制，他自己就曾多次说过发动文革时他根本没有想到最后实际发生的那种地步。可以说文革并不完全是受毛泽东操纵的，某些社会和政治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毛泽东，特别是市民对当时制度的不满。下面我们几个方面来看这些社会和政治矛盾。

### （1）学生对政治控制的造反

六十年代，全世界各地都有学生造反。但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运动其本质并不是破“四旧”，而是对严厉的政治控制的一个反作用。任何亲身参加过运动的人都不难理解当时学生确实有一种摆脱组织控制的快感。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对学生的控制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特别是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后，这种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但在毕业分配和招生方面的控制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而且还打了很多学生反革命集团。大学里划了很多内控的学生右派，在他们的档案里记载有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他们对党的政策的不满言论和对西方文化的向往等“黑材料”。在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中，这些“黑材料”成为学生造反派攻击的一个目标。学生们打着毛泽东反迫害和要平反的旗号，查抄了大批这类黑材料，并将其烧毁。

中国文革运动中的学生运动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干部子女和党团骨干为主的红卫兵运动。这个红卫兵运动除了有把毛泽东的路线推到极左的一面外，（例如破“四旧”，迫害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知识分子等）也有要求某种自治权的一面。他们发起独立于党之外的政治组织——红卫兵，就代表了这些学生政治自治的要求。另一类就是受红卫兵迫害的所谓“黑七类”组成的造反派。他们中间有四九年以来中国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有被当时的中共组织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学生，有在围攻初期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等等。总之，他们的共同利益是“造十七年所有政治迫害的反”。众所周知，四九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构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很多共产党的官员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迫害异己，组成了不少对立面。这些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在文革初期大多不敢乱动，害怕毛泽东“放长线钓大鱼”。但自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和“七月武斗”以后，老百姓自祖政治组织的自由已经成了一个即成事实，所以“牛鬼蛇神纷

纷出笼”，各种打着反迫害旗号的组织先后出现，其中首迫害的知识分子是最活跃的一群。这种形左实右的政治参与是中国文革中的学生运动与西方学生运动大不相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另外，当时中国的学校招生制度的特点也使文革学生运动具有很强的造反性。中国在四九年革命后的招生制度一直没有采用苏联式清一色政策。除对所谓“杀、关、管、逃”的子女有录取限制外，对一般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很大限制。唯一的例外是留苏学生的录取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因此当时的留苏学生的成份与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的成份很类似。但在普通大学生中，出身不好的比重并不低于所谓三部份人（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子女）。由于大学招生成绩是主要标准，所以知识分子子女在大学占优势，而这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前辈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国民党官僚，甚至是旧时代的名门望族。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后，为什么北大等高等学府都形成工农学生孤立，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的呼声占上风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就是五十年代的招生政策使学生中出身不好的人占了优势。而这种政策与共产党在四九年革命时容纳了大部份老知识分子有关，这是与苏联革命时老知识分子大量外逃不同的。

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现招生对党阀的支持是有限的。经过镇反、肃反、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等各次政治运动后，许多知识分子从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变成了反对者。所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招生政策基本上是贯彻阶级路线。但是六〇年的经济总崩溃使毛泽东的这一政策无法继续执行下去。一九六一年刘少奇下基层调查时接受了知识分子的意见，决定废止“考父母（即看成份），不考学生（不看成绩）”的录取政策。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国执行了一条比五十年代更彻底的“才能第一”的录取政策。这几届中学生、大学生的成份以知识分子的子女为主。这部份人的素养很好，本能地具有人文主义的倾向，而且很有思考能力，以中国当时的政治标准而言，他们的本质倾向是右的。这部份人曾经是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骨干力量。

一九六四年社教运动开始后，毛泽东重新强调招生的阶级路线，从这时起，重点学校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们的成份急剧变化，工、农和干部子女的比例迅速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不难发现，文革中学生的保守派往往正是由这批人和党团骨干组成。这段时期由于严厉执行阶级路线，造成了出身不好的学生及教职员的心理恐慌。很多所谓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时产生的。共产党一方面镇压这些“反革命集团”，有的被逮捕，有的在毕业分配上受到公开歧视，另一方面采取“重在表现”的政策，用录取个别出身不好的人来安抚不满。这段政治迫害的历史成了文革的动力之一。那些受迫害的“反革命”学生及“内控右派”学生是文革中最积极的造反派。奇妙之处在于，这些造反派在文革前是毛泽东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但在文革中，他们又是毛泽东反迫害的政治路线的支持者。这当然不是造反派的本质倾向变了，而是反映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有严格政治战略的大转变，这个大转变突破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并不单纯是毛泽东在极为被动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策略，而是中国现代政治中上层知识分子成份变化的一个结果。被中共所容纳的大部份老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中国和现代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人文传统，在各个关键时刻他们都会发挥政治作用。例如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之风刮到中国时，他们就利用共产党整风来呼风唤雨；一九六〇年中国经济大崩溃时，他们又利用刘少奇的改革，在教育系统掀起全面复旧，而这些活动最根本的影响即使招生制度的改革，这直接影响到了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份；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又一次影响了中国的招生制度以及与西方的关系。例如这些老知识分子利用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他们中很多人三、四十年代在美国的到学位），使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在短期内达到数万人之众。很显然，这批新的留学生又决定了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成份。老知识分子冲从自己的经历中可以体会到招生制度对知识分子成份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成份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由于现代知识分子有鸡生蛋、蛋变鸡的加速趋势，因此招生制度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几乎是举足轻重的。文革前中国招生制度的波动无疑与文革中的学生造反运动有因果关系，而且也会继续影响目前的中国政治。正因为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所以招生制度问

题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微妙和敏感的政治问题。

## （2）知识分子运动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到年底一直是受迫害的，但到“一月风暴”前后，他们开始利用毛泽东让普通老百姓自组政治组织的机会，串联起来为自己平反翻案。有的参加社会上的造反组织，有的组成文艺界或教育界的造反组织从事造反活动。从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初，这类活动有过一个高潮，这就是所谓“红色狂飙”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由文艺界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发起，借贯彻江青批判“五十天”（五一六通知到七月）和十七年的口号为名，要求为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一些受批判的有名作家甚至用自己的稿费积蓄为这一运动提供财政资助。但是这个运动不久便由江青亲自出面镇压下去了。

除了文艺界外，各单位的许多右派分子在文革中也起来闹翻案。他们有的标榜自己是最早的“老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批判“苏修”，批判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或批判刘少奇。他们往往有意混淆一九五七年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和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所以这些人是有意识利用毛泽东的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的。虽然右派分子在文革初期大多不敢妄动，但是各级领导总是把他们打成造反派的“黑手”和后台。直到一九六七年夏天前后，右派分子才在全国各地互相串联，进行有组织的翻案活动。例如北大的一位学生右派把五七年打右派的内幕写成一份类似小说的油印传单，揭露系党支书利用反右打击自己的情敌。又如湖南的一位女右派在她所属的造反派组织小报上写文章，说明当年她因“反苏”被打成右派的经过。这类有组织的翻案活动仅得到造反派中的一些所谓“极左派”的支持，有些造反派和保守派一样积极参与了打击右派翻案的活动。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刘少奇派的人在不准右派翻案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这类翻案活动很快就被消灭了。作为文革中的一种社会力量，右派分子的政治活动很有特色。他们的意识形态往往很右，但公开站出来发表的观点却很激进，有时甚至说自己是最反刘少奇、最早批彭真的人。显然他们是有意利用刘少奇、彭真等人都积极打过右派这一点，为自己的造反涂上合法的色彩，与其说是不得已的跪着造反，不如说他们是在利用共产党的矛盾来批判共产党。正如大学中保守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谭立夫所说：“他们是看共产党的脸，看共产党干部犯错误而幸灾乐祸”。当时林彪有一个按路线排队的讲话，其中说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派不能只看出身和过去的表现，而要看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站在那一边。所谓批“资反路线”就是毛泽东、林彪打民意牌来攻击其政敌的新政治战略。很多右派分子看到这份讲话后大受鼓舞，决定介入文革，支持毛泽东的新政治战略。

## （3）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

文革发动时，毛泽东除了时而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之外，主要还是利用党内红区老军人力量对彭真所代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势力的不满，来整肃刘少奇的“白区党”。当时很多军人对彭真的垮台幸灾乐祸，因为他们早就对他耿耿于怀。在地方，由于各地大多是南下的军人势力占上风，所以地方的军人利用文革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原地下党的情况很普遍。从政党斗争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文革中党内的斗争一条主线是红区党所代表的农民势力与白区党所代表的四九年前的市民知识分子势力的斗争。而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正好与此相反，他是利用白区党来整红区党中的高岗、彭德怀的势力。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后，全国出现了共产党内的在野派人物支持造反派反对在朝派的趋势。十六条公布时，彭德怀就高兴过一阵子，他的警卫员写的有关他的传记说，他当时希望利用大民主的机会向全国人民说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真相。而且凡因彭德怀事件受到打击的党内右派分子在文革中不但大量地参与了造反派的活动，而且有时也渲染早就是反对刘、邓路线的。他们的行为很像党外右派，用造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迫害等激进的口号掩盖其政治观点。文革前，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是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党内的在野派在失去其政治地位后，虽然在社会上仍然以特权阶层的面目

出现，但很少再有政治影响。而文革中党内在野派直接参与社会上的准政党很多，这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他们的政治活动来说，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政党的一种突破。党内在野派党外右派这两股社会政治力量是毛泽东在利用学生和工人运动时出现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两股力量，他的主要倾向还是压制，在文革戏剧性的变化中，这两股力量也是最早被消灭的。

#### （4）工人运动

文革中形成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无疑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大突破。在文革前，社会主义国家只会有零散的工人、学生骚动事件，形成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工人和学生运动，文革是开了先例。工人造反的矛头最早都指向本单位的当权者。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当权者大多是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为了削弱刘少奇的势力，在公交系统设立政治处时所派去的转业军人。很多工人留恋六四年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而对这批突出政治的当权者怀恨在心，不但对他们的激进政策不满，而且对他们突出政治、执行阶级路线所造成的种种人权问题不满。文革时期，中国的基层单位有两批干部，一批是六四年前的业务干部，一批是六四年各单位成立政治处后从军队转业的干部。文革开始时，刘少奇派的工作队往往是利用这批军队来的干部批六四年前的“修正主义”干部；但工人自发造反时，矛头指向的很少是业务干部而是那些民愤极大的“政治处干部”。

由于工业界的各级干部平常只对上级负责，并不真正对企业负责，所以各单位的上级机关在文革中对下层的行政控制一放松，工人造反派的经济要求马上提了出来，工人纷纷停工停产，其结果造成了真正的经济灾难。一九六七年初，中国出现了很多全国性、行业性的工人组织，例如全国的“红劳工”代表临时工、合同工的利益；“红战士”代表保姆、佣人的利益；“红旗军”代表代表工厂中的复员退役军人的利益等等。特别是“红劳工”、“红战士”这类组织有点像西方的工会，其注意力主要在经济利益方面。还有一些代表一九六二年大批下放的职工利益的组织。这些职工在经济恐慌时，自愿或被迫城市户口和职位，回乡务农。六四年后他们又陆续返回城市，要求恢复市民身份和职位。

虽然从一九六六年底开始，全国各地的工人组织向当权者提出了增加工资等经济方面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以反经济主义妖风为名压制下去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也相继被取缔。后来工厂工人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本单位的派系斗争（有的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转变为造反派内部的派系斗争）。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

#### （5）变相的政党自由

一九六七年初，当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以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并允许普通老百姓向政府机构注册登记自组政治组织后，中国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出现了短短两年的变相政党自由，而且人们也的确有选择参与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自由。也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及时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像政党一样出现了”。文革前，毛泽东严格地实行党禁，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为首分子都要以反革命罪名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或死刑。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活动控制之严格是世界上鲜知的。这可能与共产党自己推翻国民党的经验有关。但毛泽东一反常规，在文革中变相地开放了党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稳握军队和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使他当时成功地实行了打民意牌的政治战略。他清楚地知道，民众对党官僚的不满可以由他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上去。不过，在一九六七年初他对此信心并不太足，因此他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取缔全国性组织，在全国揪了一大批反革命集团并对其进行镇压，这就是史称的“二月逆流”大镇压。这次全国性镇压至少打了二十多个大型群众性的“反革命组织”，拘捕了二十多万人。年纪大一点的老百姓都觉得这次镇压比镇反时的行动规模还要大。但这次镇压并不十分奏效。

由于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工人、学生运动和政治派别，这次镇压激起了大多数群众的反抗，不但被关的人进行了绝食等抗议活动，同一组织的监外成员又重振旗鼓改换名称继续进行政治活动。而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一方面被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对文革的攻击所激怒，另一方面发觉限制全国性组织后，政治的地方化可以使他在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时，分别与各省政治派别谈判来控制局面。很有意思的是，全国性组织被取缔后，在这种政治地方化格局中，虽然各政治派别的政治观点仍然是全国性的，但当局镇压某省的一个组织时，其它地区同一观点的组织也不敢联合起来反抗。例如镇压武汉的“百万雄师”时，同一派的湖南“高司”就不敢表示同情。这大概是毛泽东能控制变相政党自由的秘诀之一。

一九六七年春天，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又重新下决心利用“二月逆流”造成的人权问题继续向党内保守派发起新的攻击。到了六七年的夏天除全国性组织之外，在“二月逆流”中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平反。各地民众敲锣打鼓把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从监狱里接了出来，并给他们戴上英雄式的红花。这个从由被迫害的激愤所形成的一种半合法的社会思潮和势力，到靠自己的斗争终于获得平反的过程，可以说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平民百姓实在是太激动人心了。从此以后，所谓反革命概念的神秘性不再在中国存在了，政治制度的权威性也开始动摇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所谓信仰危机正是在这种长期政治冲突和黑暗中逐步形成的。

在这个一反一复的过程中，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和可悲的角色。他以有机会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对造反派进行镇压，如果毛泽东需要的话，也会同意他的做法；但毛泽东不需要时，又会把周恩来推到前沿变成带他向民众示好的替罪羊。不幸的是，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周恩来受毛泽东之命大规模镇压造反派，结果又造成了严重的人权问题。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竟然再一次打人权牌一用平反的手法，将周恩来置于极为危险和被动的地位。

从毛泽东队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多变的态度可以看出，“反迫害”和“平反”始终是他对付党内保守派最灵的一张政治牌，而打这张政治牌成了毛泽东的政治风格。一九六七年夏天反“二月逆流”他是打这张牌；一九六八年三月批“复辟逆流”他也是打这张牌；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他还是打这张牌。他渐渐体会到党内保守派最难改的习惯就是对政治异己搞报复迫害，而每到紧急关头能使他与保守派斗争中号召人心的只有这张牌。很客观地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权问题，毛泽东的文革只会到破“四旧”为止，不可能造成后来那样大的政治震荡。所以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病和当时的政治权威对下属人民进行政治迫害的嗜好，是应该与毛泽东一起对文革带来的灾难负责的。

#### （5）文革中的“异端邪说”和极左派

自组政治组织的自由最后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六八年各地出现了企图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所谓“极左派”。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希望用新的政治观来解释文化大革命，而不再满足于“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官方学说。他们指出中国新的高薪特权阶层的问题，呼吁中国需要重新革命，并提出真正实行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民主等观点。这些人很像苏联、东欧国家内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执不同政见者。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有北京大学“共产主义小组”，湖北“北斗星学社”，上海“支联站”。湖南“省无联”以及山东的“十月革命小组”等，这些“极左派”组织后来都被一一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对各种“异端邪说”的镇压一方面是因为群众性政治自由导致了文革的发展有可能会脱离毛泽东利用人权问题搞宫廷斗争的轨道，另一方面是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大崩溃造成的秘密政党活动在文革中又活跃起来了。这使得毛泽东最后决定暂时停止打民意牌的政治策略。

文革中的秘密政党非常活跃，主要有亲苏倾向的劳动党，亲西方的民主党，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以及农民会党性质的一贯道等。因此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九·九运动”，一直到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文革出现了又一重大反复，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派联合起来重新支持基层的保守派，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进行全面镇压。毛泽东从右边打民意牌的策略就此结束，他从新恢复党的左的本质，强调阶级路线，解放各级干部，并以党团骨干、保守派的群众作为党的社会基础。这一连串镇压造成了比“二月逆流”更严重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一九七〇年，中央将杀人的审批权下放到各省，枪毙了大批政治犯。其中很多没有确凿证据，只有从事政党活动嫌疑的人也被当作政治隐患而遭杀害。林彪事件后，又来了一个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凡是在文革中造过反的都受到了严厉打击。

值得强调的是，一九六七年夏天以后，毛泽东自信已完全能够操纵造反派，而造反派不但口头上拥护毛泽东，实际倾向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但是“造十七年的反”与造共产党的反并没有绝然界限，所以十七年来一直受压的国民党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纷纷活跃起来。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下决心镇压这些异端。事实上，毛泽东只是发动了一个没有结果的造反异端，而没有真正形成在上下层有合法的不同政治派别的平等竞争局面。这众所谓造反也是以恶对恶，迫害曾迫害过的人，它当然只会带来新的暴政。但文革与以往的革命不同的是，它不是一个新老暴政的交替，而是毛泽东勿支持造反到镇压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否定之否定。很显然，如果他任造反派发展下去，被推翻的国民党势力和右派等的平反问题都会自然发生，而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合法性是不容挑战的，作为倾向于这种挑战的党外任何被镇压的政治力量自然也绝对不能平反，很可能引起动摇他自身权威性的任何异端邪说都必定被镇压下去。例如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即清查超出他所能容许的造反范围的执不同政见者），他说“文化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到了一九七一年他和周恩来派联合起来彻底镇压造反派时，他又说“五一六”（造反派的别名）“是和国民党一样最大的反革命”。从这可以看出，共产党对国民党以及其它政治势力进行压迫的合法性实际上也决定了问个不可能有所谓的民主色彩。

### 三、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后果及其意义

真正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所突破的文革只有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的短短一年多时间。而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痛恨的文革黑暗时期，主要是这之前的红卫兵运动 and 这之后的军事管制和半军事管制下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包括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农村，许多共产党的领导被监禁致死，大量的政治犯被枪毙，社会上派系斗争导致的政治报复等）。但是真正的造反派运动是发生在这两个时期之间，造反派运动的本质是反迫害的，在这个运动的前后，造反派都没有权力，因为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残酷的真正迫害最盛的时期。这些真正迫害是直接由军人和保守的真正官僚相结合推行的。当然，力是倔不悔抹去在造反运动中那些不良分子所干的打、砸、抢、抄的恶绩，但对整个造反派到底给予什么样的历史评价，这也许是中国未来政治家仍可利用的一张牌。

在我看来，文革的灾难主要应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病负责，应由党是中共当内的当权人物历次所搞的政治迫害负责，而貌泽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支持的造反运动却突破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中国今后的政治演变有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开了人权问题和民意牌的先例，把党内的权力斗争向社会开了门，因而使这个制度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挑战。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使党内两派并存下去，他自己超越于两派之上，见风使舵，施展平衡手法，从这方面而言，他确实通过文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从一九五九年后的被动转为主动，用搅混水的办法，形成新的党派结构，使得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都要通过他来与对方打交道。当然，这只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暂时的权力结构，他在接班人问题上还是彻底失败了。



现在的一般舆论谈到文革，总是以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作为其时间标志，而且一概加以否定，这样往往使文革成了一段混淆不清的历史。我认为就中国市民的情绪而言，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打人权牌时。他们是真正支持毛的路线，并对刘少奇的倒台兴高采烈，而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毛泽东、林彪重新与党内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时，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受害者，他们开始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所以说，中国市民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也是文革后期党内保守派和军人联合专政的受害者。以上这个说法自然涉及到文革的分期和定义的问题。按我的想法，文革应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一个是批判“三家村”和破“四旧”时期，这是毛泽东将党的政治路线推向极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中国市民是受害者；第二个时期是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这是毛泽东、林彪打人权问题这张牌的时期，也就是周恩来后来说的“形左实右”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市民是积极参与文革的自由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迫害；第三个时期就是毛泽东联合和依靠党内保守派与军队镇压造反派运动，企图恢复文革之前的政治秩序，这个时期对中国市民的创伤最大，他们对文革的反感也最深。

#### 四、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政治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深。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受了苏共社会主义民主化和赫鲁晓夫改革的影响。毛泽东当初发动整风运动时并不是真的放长线钓大鱼，二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知识分子真的支持党的政策。后来他发现情况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于是才停止搞大民主，采取了紧缩政策。反右运动后出现了经济大崩溃，从此开始，毛泽东最大的心病就是害怕重踏斯大林晚年之路。这一精神压力终于导致了他发动起文化大革命。所以说文革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是苏联政治制度失败的一个间接产物。毛泽东晚年基本上是奔忙于突破或保持苏联式政治制度之间。他想要不重踏斯大林的老路，就必须突破苏联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突破却又与他的基本政治素质和理想相冲突。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便是中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政治大幅度波动的主要根源，而文化大革命几乎使这种波动的形势固定下来了。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特点，那就是政治空间的一元化与时间上的多元化相结合的格局，也就是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内，政治是高度一元化的，而在寻求政治制度的突破和进行政治试验的时期，其一元化的政治局面是极不稳定的，所以形成了时间上的多元化（波动）。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政治特点，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已不会使中国人太吃惊了。在每次波动中，任何人都不敢也不可能反抗政治潮流，而任何政治潮流的受害者都已把其希望寄托于下一次的波动。

但是，以上这种奇特的政治格局并非是永恒不变的。由于文革中不仅广大市民受到迫害，中共党内一大批政治领袖也受到了伤害。因此当这些政治家在后来的政治波动中被再次推上权力中心时，他们有意打破以往的政治格局。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空间有了多元的趋势，而时间上的多元，即波动的频率，已减少。我认为邓小平复出后所创造的新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最大影响。

形成这种格局除了政治领袖的个人作用外，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市民对革命民主主义的本质有了很透彻的认识。十年文革后，人民群众都普遍有一种“反革命”的情绪，至少是对革命厌倦了。在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中，真正活跃的人大多是文革中还不太懂事的年轻人，文革中的造反者在民主墙运动中都没有多少活动，而他们中许多人在后来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却是真正的活跃分子。他们这些人不仅活跃于学术界、文化界、经济界，甚至也在政界发挥其影响。这些人在改革中扮演的角色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文革的教训，已经认识到专制和政治迫害必然引起革命，而直接的革命民主一定会带来新的暴政，革命与暴政是非民主政治的双胞胎，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政治结构。

二十年过去了，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目前仍难全盘估计，但至少他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破是非常明显的。在不久的将来，史学家们还会严肃地面对文革暴露出来的社会政治冲突和制度缺陷等问题。但那时候大家不会再争论在文革中谁错谁对，不少人会承认谁也没有掌握所有的真理。今天很多骂文革中迫害过自己的人，他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在文革前搞了多少政治迫害。现在谁都说自己在文革中是被迫害的，但谁都不反省自己对别人的迫害。如果谁都认为自己迫害别人是有理的，那么政治黑暗永远也不会结束。很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文革前中共党官僚对市民的政治迫害，毛泽东也不可能发动起这场革命。所以我们有必要从这点去重新思考文革的教训，通过这种思考，也许我们真的有一天能找到不同政治派别和平共存、平等竞争、禁止一切政治迫害的新秩序。这样的话，中国就可能真正长治久安了。

□ 原载于《知识分子》No. 4 (1986)

~~~~~  
【悠悠岁月】

我的一生

• 杨小凯 •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经济观察报》编辑时有所删减。〕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年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 ◇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

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 ◇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時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 ◇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已想的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进去了。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 原载《经济观察报》

~~~~~

## 【亡灵祭坛】

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

• 郑 义 •

杨小凯走了，我的心沉重得像一扇磨盘。

一位自由的呼唤者离去了。感到须努力把持自己，不要让那些像火一样燃烧的岁月，那些他和我都永志不忘的历史随风而逝……

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无论是在争取自由的战火中，还是在远离尘嚣的书斋里，都是一流，超一流。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还不到20岁吧？36年过去，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据小凯后来追忆，在形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他曾经受到北京青年学生造反派的影响。

但我和我的青年同伴们不知道北京有谁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惊世骇俗的文章，但我们都知道：湖南出了个杨曦光！这一共产暴政下饱受践踏蹂躏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渴望，小凯表述得最尖锐最深刻。因此，这位青年思想家，这位英勇的代言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权势者们所谓“彻底否定文革”，要掐灭的正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这种“实现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觉醒。36年过去，小凯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见其光辉。今日之中国，官即为匪吏即为盗，不仅人民未能对他们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反而被他们又搞了一次“再分配”，半世纪积累的国有资产被瓜分了，千年开拓的土地被抢夺变卖了，银行里的血汗钱被千亿万亿地卷逃了。我猜想，当中国人被抢成了身无立锥之地家无隔夜之粮时，也许会为时已晚地想起杨小凯，想起他青年时代那充满热情的真理的呼唤。

唯一让人稍有安慰的是临终之际甚为安详。

没去过小凯现在的地方。相信那里不坏。小凯是有神论者，在神为他安排的归宿，必定有洁净的空气，有五色花，有大的光明。

他的艰难跋涉终于可以休止了。

以文革幸存者论，我们这一代人中有谁活得比他更棒更精彩呢？好像没有了。

从浴血奋战的反抗者，到创立学派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一代天骄！

□ 2004年7月8日于华盛顿D.C.

~~~~~

【往事如烟】

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

• 华新民 •

郑义在“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一文中，引用了杨小凯当年写《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段话：“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郑义说：“历史已经把他的这段文字精选为文革异端思想最辉煌的经典。据小凯后来追忆，在形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他曾经受到北京青年学生造反派的影响。但我和我的青年同伴们不知道北京有谁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惊世骇俗的文章，但我们都知道：湖南出了个杨曦光！”

杨小凯本人在“‘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中说：“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可见，早在一九六七年，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在北京和其它地方的大、中学生中已经有不少的支持者。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可以说是这股思潮发

展到“顶峰”的作品。笔者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中国科技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科大当时为五年制，还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旧校址。）也曾卷进过这股思潮。写下这段经历或许可以为文革初期异端思想的源头作一个历史的注脚。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的时候，经过几个月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学校里的同学们亲眼目睹了过去视为神圣的各级党组织、工作组一个个相继垮台的场面。由于《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已经拔地而起，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局面，笔者和许多同学一样，有一种焦虑困憾的心情，希望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时，我们读到了一篇由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这篇大字报的立论根据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个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要不了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这是一段在文革前几年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学习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语录，不过当时只是当作伟大领袖以苏联为前车之鉴对国人的告诫。北航的这篇文章则把它同毛泽东指责刘、邓在文革初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认为刘邓的路线，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及工作组实施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和机关，“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岂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法西斯党？

笔者手上没有这篇大字报的文字资料，除了标题以外，文章中的字句已经没有记忆，上述内容只是今天记忆中的印象。这篇大字报当时广为流传，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起到了打开思想闸门的作用。我们的“战斗小组”当时就讨论，既然苏联那样的法西斯党已经在中国出现，那么苏联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它的特权阶层是不是也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呢？这本来是人们不敢探讨的问题，但那是一个“思想解放”或者说“怀疑一切”的时期，人们的思想开始冲破牢笼，除了揭发工作组和党的领导在“五十多天的时间内”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也开始揭露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种种特权，比如邓小平等人在“养蜂夹道”的高干俱乐部、高干专用的特别供应商店等等。这些特权在文革前一般老百姓隐约有所闻，这个时候，许多干部都成了“走资派”，群众没有了顾虑，又享受着写大字报的自由，高干享受特权的事例就大量披露出来。今天中国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同这些特权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过去都是受的“正面教育”，第一次接触到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很自然就感到触目惊心。再说，当时报刊上说苏联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所举的不就是这一类证据吗？什么高薪阶级啦、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啦。记得文革前的《人民日报》为了证明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抗战时期一直呆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分子，就刊载他每天的食谱：黄瓜多少片、鸡蛋几个等等。这种宣传使得人们把生活上的享受和特殊化等同于“变修”。对照文革前我们对修正主义的这一类批判和当时大字报的揭发材料，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上层干部已经“变修”了，已经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曾经是革命者，但是革命胜利后就从人民的公仆“和平演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难怪会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对干部的批判，使中国避免走上跟苏联同样的道路，具体的办法就是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使群众可以批评和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干部，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大大的改善。

在得到这样的结论以后，我们都很兴奋，自以为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谛，于是决定写一份大字报同大家分享我们的“理论发现”。这篇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主要就是阐述我们心目中的毛主席在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告诉大家，根据

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划分的，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文章特别强调了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反对国民党的革命不同，“新”时期里有“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革命对象。大字报是用我们战斗小组“红炮班”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在校园里贴出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大部分的反应是“热烈欢呼”，许多本来不相识的同学都来找我们讨论，有的认为解答了他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也有的人替我们捏一把冷汗，认为我们的大字报里“阶级关系新变动”的主张太离经叛道。当然也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的理论中被划为革命对象的干部的子女，认为是“大毒草”，是“右派言论”。记得有一位叫王永明的同学介于这两者之间，他专门找到笔者讨论，表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是也不同意给我们扣帽子，企图以理说服我们。三十多年过去，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理由，用现在的语言说，他大概认为我们“政治上不正确”。当然，那时我们头脑发热，是听不进他的意见的。这个王永明文革后成了“五笔字型”的汉字电脑输入法的发明者，那又是后话了。

我们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很快就流传开来，有同学告诉我们，他在清华大学看到了这篇文章转贴在那里，后面批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来的人各种各样的评论。（当时全国红卫兵进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活动正处于高潮。）也有人告诉我们，这篇文章被人误传为“林副主席讲话”到处印发，当时我们听了很得意，因为林彪当时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新鲜提法，比如他说，文化大革命是“革我们革过命的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的文章被当成是他的讲话，说明它很有新意，而且是符合林副主席的思想的，而林副主席是跟毛主席最紧、最理解毛泽东思想的。

但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文化革命的一系列现实很快就使我们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疑问。一九六六年和六七之交，中央文革掀起了一股抓人风，不仅抓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动，而且抓给林彪提了一点意见的农大附中学生伊林·涤西，（据说伊林是列宁曾用过的化名，涤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用过的笔名。）我们学校的一个组织“雄师战斗队”，因为贴了一张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的大字报，也由康生直接下命令抓了起来。在这之前，中央文革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主张群众有权利向领导提意见甚至反对领导，不应受到惩罚，让人觉得他们不同于刘邓的路线，有一番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气象，因而赢得了学生的拥护。现在，同样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对付反对它或甚至只是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强横和蛮不讲理比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接着，在“一月革命”中，上海有学生炮打张春桥，也不由分说受到了同样的处理，哪里还有一点“巴黎公社”的气味？另外，“一月革命”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毛在八月份欢呼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时，称它为“二十世纪‘北京公社’的宣言书”，而上海真的成立公社了，他却改口了，让人怀疑他老人家是不是叶公好龙。与此同时中央又发布通告取缔“合同工、临时工”以及转业复员军人的全国性组织，反对所谓“经济主义黑风”，从这些举措看来，毛主席似乎也无意解决普通工人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这一切，都使我们原来“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曾经用过的说法）希望成为泡影。

再往后，在当时从铺天盖地的批判彭德怀的大字报中，我们注意到很少有揭发彭个人生活特殊化的材料，而毛泽东、中央文革和林彪要“保”的人当中，倒有像邱会作这样生活腐化、被群众所不齿的“修正主义分子”，据说林副主席有指示，邱会作“偷鸡摸狗”只是小节问题。连这种“蜕化变质分子”也可以进“无产阶级司令部”，让人感到，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革”要“保”的人，其实是以我划线，没有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尤其是后来军队介入运动，同样是军队的干部，如果早几年转业到地方，多半就成了“走资派”，留在军队里的到地方上支左，就成了当然的革命派，如果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享受的特权来看，当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开始让人明白过来，文革整“走资派”原来并不是林彪所说的那样要“革我们革过命的命”，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需要呢？这就是发动群众去打倒“无产阶级司令



部”定为是“走资派”的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甚至也包括朱德、陈云、陈毅这样的人。在揭发他们“罪行”的大字报中，最有实质性的内容，都是说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从这些揭发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这就是，在文革发动的前几年，党的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着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的不同政见。记得有一篇揭发陈云的大字报说，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家乡青浦（上海郊区）调查，回来后在中央的会议上说，农民反映“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幸福——吃粥。”这一类的怪话，笔者在那几年也能从来自农村的乡亲那里听到，但是那时自己“要求进步”，都以为是落后分子的说法，现在看到陈云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以同情的口气引用，可见“三面红旗”在党的高层遭到的反对之强烈。联想到文革初批判《海瑞罢官》时把海瑞同彭德怀联系起来，又听到了首都“三司”的司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等人被受他们审问的彭德怀所说服，企图外逃的传说，从而开始意识到文革原来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以及那几年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有关系，而“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种种说法，只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手里的一张牌而已。这一认识的转变使我们反而对那些因为同毛泽东持不同政见、敢于“为民请命”而受到批判的高级干部，包括本校的党委书记、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刘达，产生了一定的同情甚至敬意。以至到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们毕业分配时，正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毕业鉴定”里表态声讨“内奸、工贼、叛徒”刘少奇。我们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就私下里商量：刘少奇这个案子简直是儿戏，将来迟早要翻，但是毕业鉴定里不表这个态军宣队和工宣队是不让过关的，所以表态要抽象，尽量避免点他的名，以免将来在自己的档案里留下“攻击刘少奇”的口实。可见那时我们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再回到一九六七年初，我们的战斗组因为抗议中央文革随便抓人而被本校掌权的造反派宣布为反动组织，连带我们的那篇鼓吹“新思潮”的大字报也同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联系起来，被宣布为大毒草。而原来倾向较保守的一派组织，干部子女较多，也因为那篇大字报而把我们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因此我们被两派都打入了“另册”。在受到抄家和一段时间的批判之后，我们就成了等待“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十六条”中说：真正的右派份子要放到运动的后期处理）。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资格，游离于两派之外，塞翁失马，给我们带来了两条没有预料到的好处。第一，早早退出运动，成了被迫的“逍遥派”，就减少了在以后犯错误、做坏事的机会。诸如到全国各地去支援造反派，参加当地的武斗，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进入专案组，参加对本校干部和师生的迫害，等等，都没有我们的份；第二，有机会静下来读了一些书，进行反思。我们本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政治书的兴趣只限于对付政治课的考试，文革把大家的政治热情调动起来了，又有了这几个月的遭遇，就“带着问题”阅读了不少有关的书籍。读了之后才发觉，我们在自己那篇大字报里的“新思潮、新发现”，其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老问题了。苏联的托洛茨基早在二十年代反对斯大林“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共产党人掌握了国家机器，不可避免要腐化变质，因此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共联盟”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德热拉斯在他的《新阶级》一书里，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自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统治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集团，是一个新的阶级。因此，我们虽然不再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反对“特权阶层”而发动文革，但他能利用这个口号来动员群众，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夺权以至武斗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中国和其他被他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国家一样，确实存在着新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作为对我们那篇“毒草”大字报的惩罚，毕业分配时，我和同班的倪诗茂同学（现居美国芝加哥）因为是起草和定稿的“主要责任者”，被军、工宣队定为“待分配”，在学校里多留了半年时间接受审查。然后我被“发配”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是我们那一届学生中全校唯一分配到这个边远省份的人。到了云南以后，还是摆脱不了这张大字报的阴影，一九七一年，我已经在昆明钢铁厂当烧锅炉的工人，省里开始了“深挖五一六”的清查运动，厂里自然把北京来的大学生作为重点，而本人因为有这么一个“历史问题”，车间里已经开始把它透露给积极分子，

动员接近我的人贴我的大字报，我也已经同靠得住的朋友作好了“后事”的安排：如果被“隔离审查”，请他替我通知家人。就在这时，没有想到竟然是林副主席救了我——原来云南的运动比内地要延后半拍，其它省份清查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云南则刚刚开始，就在车间里开始出现针对我的大字报时，他老人家连同家人在蒙古从天上掉到了荒沙里，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清查运动就此无疾而终。可怜林彪他堂堂共和国的元帅，几年前全国人民都敬祝他身体“永远健康”，要以“以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他，可是当他在“九一三”那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蒙古荒漠的上空走投无路的时候，亿万人民完全蒙在鼓里，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人会实践当年的誓言去保卫他，倒是他和他的家人“以鲜血和生命”让许多流落在小角落里的我这样的人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虽然逃过一劫，这段经历一直使我心中余悸犹存，直到一九八〇年，本人在合肥的中国科大考上了李政道先生的留美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心里还在忐忑不安：不知道出国政审会不会把我的这段老账翻出来？

这一切，如今都成了几十年的往事。而我们的那张“新思潮”大字报，由于我们自己不久基本上放弃了其中的观点，又因为受到了批判，怕被当作保存“变天账”，竟然也没有保留下文字上的记录。也许在自己的档案里，从关于它的审查记载和自己的检讨中，可以找到原文中的一些字句。如果中国当局同意，本人倒是乐意公开个人档案，为史家提供一份原始资料。现在只能通过同倪诗茂等老同学一起凭记忆作以上粗疏的回忆。从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表达的“异端思想”最早在一九六六年秋天出现于北京，在我们的大字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之前，已经有“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稍后，有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它走得比我们更远，提出了“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再往后，在一九六七年春，又有中学生激进派的“四三派宣言”，其中同样提到了“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的爆发。在大学里，六七年的夏天，清华大学的周泉缨在“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中批判对立派的“大翻个理论”，主张“阶级关系不变论”，可见在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中主张“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大有人在。只是经过六六年冬、六七年春季的镇压，这样的主张已经不能在北京公开宣扬，有这样主张的人，无论是否相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仍然支持造特权阶层的反，都知道阻力太大，这种事只能做，不能说。

二，北京出现的这种“新思潮”很快就消退下去了，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铁腕镇压，另一方面同北京运动的特点有关。特点之一是，北京运动走在全国的前面，中央的斗争很快就暴露在群众前面，人们较早认识到文革的政治背景，就会如同我在前边所述那样，较早对毛泽东的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失去了兴趣。在后来的几年里，毛泽东一会儿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鼓动造反派斗争“走资派”，一会儿又说，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过去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给保守派镇压“地富反坏右”提供根据。他在临死前不久又重提什么“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劳动人民的对立，已经不能引起人们的反响。到了一九七六年，当年那些追随他“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现在在天安门广场上呼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化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样的认识变化，宣告了毛泽东文革的失败。北京运动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基本上是学生和机关职员运动，工人运动很弱，也没有同学生运动联系，运动初期出现的“异端思潮”多属缺乏社会经历的学生们根据文革前学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从逻辑上推演出来的。比如与我们的大字报差不多同时，北京大学有人写了一张题为“造三个大反”的大字报，也是鼓吹“阶级关系新变动”，他们的逻辑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总不能老是斗争地主、资本家吧？他们死了以后斗争谁呢？如果说斗争他们的子女，那不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了吗？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要从社会本

身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从历史里去找。这一类的“理论”，虽然不乏敏锐的直觉和观察，能够引起一时的轰动，但缺乏“群众基础”，在政治压力面前很快烟消云散。

三，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本文开头那一段所述的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思想。不难看得出来，它是同上面所述的北京的“新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九六八年初问世的，那时北京的群众已经经历了“夺权”、“二月逆流”，“武汉九二〇”以及“王关戚倒台”等一系列事件，即使还没有对毛泽东失去幻想，也已经懂得了政治斗争的诡谲和险恶，不会再天真地公开主张“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周泉纁则早在六七年的夏季已经看破了天机：毛泽东在打倒了他的政敌之后，就会收起他的斗争“走资派”这张民意牌，还是要让干部重新出来，实现“河归旧道十七年”。和北京的造反组织不同，湖南“湘江风雷”这样的外省造反派多是学生、工人和其它社会力量的联合体，其中不乏在社会底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分子，正是在这些人当中“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找到了真正的群众，他们即使在一开始或者在后来知道毛泽东并不真心要推翻特权阶级，但仍然特别坚持这样的理论，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河归旧道十七年”对他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意味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作为这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杨小凯在“‘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一文中说：“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爆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这就把发源于北京的“新思潮”发展到了极致，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杨曦光的理论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各省造反派中影响特别巨大，原因就在这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受到了中央和湖南省当局的所有政治派别的一致围剿和严厉惩罚。

四，杨小凯在文革后到海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知识份子》，1986）一文中说，“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羞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从他后来‘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这段话说明，经过牢狱的磨难，他对文革爆发的原因也得出了与原先完全不同的结论。但笔者以为，这并不否定他要从中国社会冲突中寻找文革原因的努力。这是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一是文化革命中各派政治力量冲突背后的社会原因。这就涉及到“一个文革论”和“两个文革论”之间的争论。大体来说，“两个文革论”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他自己的原因，就是打倒上层领导中的政敌；而群众参加文革则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就是向特权阶层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两者各怀“鬼胎”，互相利用：毛打民意牌利用群众中争取平等的要求来实现自己打倒政敌的目的，群众则利用毛的威望和一部分言论来同当权派斗争，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个文革论”者则认为，毛主席“同人民心连心”，没有自己的动机，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实现反修防修的理想。可以看出，争论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是存在特权阶级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冲突的，分歧点只在于毛泽东是否有个人的动机，攻之者说有，是为“两个文革论”者，辩之者说无，是为“一个文革论”者，“两个文革论”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毛的动机是要维护他的已经被证明失败的“三面红旗”的路线，清洗反对他这条路线的同僚。从笔者自己的经历以及朱成昭、杨小凯、王希哲、郑义等人士的遭遇来看，在文革开始时，大家都是“一个文革论”者，但是随着运动发展，或先或后都变成了“两个文革论”者。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说“一个文革论”者

已经所剩无几。据近来有文章透露，毛泽东在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也承认“人心不在我们这边”。一场开始时万众一心的运动，为什么会到头来变得这样众叛亲离？

这是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本文能为这样的探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